



怎样做好

生产队财务会计工作

1. 莫斯科和蘇聯其他城市的社會主義改造

——卡岡諾維奇在 1931 年 6 月蘇聯共產黨(布)中央
委員會全體會議的報告

(本文爲卡岡諾維奇報告的第一、第四、第五章，係根據莫斯科國際出
版公司 1931 年英文版譯出，只供參考)

十月革命與城市發展

現在我們正在進行改造城市(尤其是莫斯科)及消除城市建設中所存在的缺點的工作。這件工作與舊大工業中心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新城市的建設等重大問題是分不開的。這些新城市的建設都是由於新工業中心、機器拖拉機站和蘇維埃集體農莊的廣泛出現而產生的。

我們就在這種社會主義的建設過程中遇到了這個重大的問題。然而我們的黨却是始終如一地有步驟地解決了或正在解決着社會主義革命中的種種基本問題。無產階級自十月革命取得政權並使它在國內戰爭期間得以鞏固之後，隨即在新經濟政策的基礎上跟農民階級取得了同盟；更由於國家工業化及農業集體化的迅速發展，我們現在已經面臨着改造舊城市和建設新城市的問題了。

我們的黨不斷遇到這些彼此關聯着的問題，而且在每一個歷史階段中，它都是爲我們無產階級的黨所最重視的一個特殊任務。

十月革命與城市建設

由於多年以來跟剝削工人階級的資本主義進行鬥爭的結果，我們的黨在十月革命後不僅粉碎了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政權機構，不僅沒收了私人銀行、商業和工業的資金，同時還廢除了資產階級在城市中的住宅私有制度。此外，黨和無產階級專政不但以新的城市管理機構——工人代表蘇維埃——代替了舊的腐朽的管理機構，並且將城市行政權置於無產階級掌握中。這完全是爲了滿足無產階級的需要及打下早日完成歷史任務的基礎。

今天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市政建設工作都披上「民主」的外衣了。即使資產階級曾經做過一點點改善工人住宅區的工作，那也不過是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被迫如此的。譬如城市中的傳染病是會蔓延到資產階級的居住地區的，可是事實上，在城市改善方面，資產階級所採取的却是一種公開的赤裸裸的階級剝削政策。資產階級對於他們在機器工廠和手工業製造廠所剝削的工人的剩餘價值是永遠不會滿足的，至於城市管理只不過是一種對工人階級進行額外剝削的手段而已。

有些天真的人們竟然相信，像倫敦、巴黎、柏林和維也納等大城市，照例都是秩序良好和環境整潔的。自然，那些城市無論在物質上或建設技巧上都具有比較高的水平；比較我們的城市要來得好些。這正表現了一個突出的事實，便是工人階級只能居住在最悲慘的環境中。在賈克·倫敦、邁克哥爾德或某些作家的作品中，你會看到描寫倫敦和紐約等城市的貧民窟中的悲慘景象；在這些城市中勞動人民的住宅區到處都是潮濕、污穢並流行着各種疾病。

在維也納，社會民主黨對他們在那兒所建造的住宅大吹大擂，其實

呢，絕大部分的工人仍舊住在環境極端惡劣的營房式的建築物裏面。

毫無疑問的，在我們的城市建設和城市管理的工作中，基本上是有着完全相反的政策。正如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一樣，既沒有剩餘價值，也沒有什麼剝削。在蘇聯的土地上，工人們爲自己做工，他們的剩餘產品都用來建造新工廠、城市、住宅、醫院和學校等等。對於我們，管理城市的唯一目的是給予工人階級以可能的和最好的公用設施，爲工人們生活的地區進行最好的和可能的改善。在革命以前的俄國和今天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住宅供應是私人資本家剝削勞苦工人的殘酷手段之一。在蘇維埃國家裏，住宅區早就社會化了，它們已是完完全全爲工人階級服務的了。

十月革命也廢除了舊的資本主義的城市行政政策，使那些從前住在最悲慘最骯髒的地區——如地下室、營房式建築、出租住宅或下等客棧等等——的男女工人快樂地搬進那些以前是資產階級居住地區的現代化或貴族式的住宅去。例如僅僅在莫斯科就已經有 50 萬工人遷入市中心的現代化住宅中，而革命前的沙多瓦區的人口中，工人祇佔 3—5%，現在已增加到 40—50% 了。

讓我來舉個最近調查的實例吧。

姆·布邦特左夫，細木匠，「格阿菲齊克」工廠的突擊工人，36 歲。他在革命前只能從一個地下室搬到另一個地下室去。1920 年間，在克列布別路洛克 19 號一所貴族住宅中，他始分得住處。革命前這所住宅住着一位退休的將軍凡什洛夫，英國領事洛克哈特，採礦工程師費林以及別的貴族和房客。現在這座富麗的大廈所住的幾乎全都是工人，布邦特左夫夫婦和他們的 6 歲女兒佔用了 15 平方公尺面積的房間。兩個月前，他們又添了個兒子。

我們可以舉出無數個像這樣的例子。

我們黨在綱領中說：「蘇維埃政府沒收資本家和地主的全部住宅，並將它們移交給城市蘇維埃。住在城郊區的工人們將大規模地遷入資產階級的住宅去。但這些住宅中最好的則交給工人的各種組織機構使用。同時還着手以各種傢具……等供給工人的家庭。」黨還表示：「盡一切方法來改善勞動人民的居住環境，拆除不適宜居住的住宅，根據工人階級新的生活情況去重建舊住宅並蓋新住宅，同時徹底地重新分配工人們的宿舍。」綱領中還規定爲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將採取大規模的改善環境衛生的措施，它包括許多方面。例如：一、改善居住地區的衛生環境，如保護土壤、給水和保證住宅周圍有綠地及新鮮的空氣等等；二、根據科學的衛生原則，供應居民需要的營養食物。

雖然在恢復爲帝國主義戰爭和武裝干涉所造成的巨大創傷的建設工程中，我們碰到了極大的困難，但過去數年間，我們在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勝利的基礎上也做了許多市政建設的工作。如在過去5年中，我們在全蘇聯建造新住宅的事業中就已投資 35 億盧布，建造了 3 000 萬平方公尺面積的住宅。到 1931 年就有約 100 萬戶工人搬進這些新住宅居住；僅僅在 1931 年這 1 年間，將有 60 萬戶工人得到住宅供應。舊城市和新城市的電車、自來水和下水道……等系統大大的擴充了。在巴庫、明斯克、斯大林格勒、皮爾及其他城市，首次裝設了電車系統。實際上，在工人階級住宅區中，都已增加了電車、自來水和下水道的設備。

從工人階級生活上日漸增加的需要的觀點上來看，我們已做的工作雖然還嫌不足，但讓那些資產階級的誹謗者們瞧瞧吧：在歐洲，只有這麼一個國家在短短的 5 年間進行了那麼大規模的住宅建設。在這期間，有些舊城市，如巴庫、格羅茲里、列寧格勒、諾窩西比爾斯克、尼茲尼-諾夫哥羅德等已經重建了。同時還建造了一些完全嶄新的城市，如

瑪格力托哥爾斯克、德涅伯羅斯特、庫茲涅次克、得滋因斯克等等。

從恢復時期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十月革命後，爲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而重新分配的城市資產，在物質與技術水平上是比較低的。同時由於帝國主義大戰，國內白軍反革命及外國帝國主義的干涉戰爭，使得我們的建設遭受了很嚴重的破壞。即使我們蘇維埃國家始終如一地採取了無產階級的政策，我們過去不能而且直到今日仍舊不能完全滿足無產階級自十月革命後大大增加了的生活上的需要。

在國家的經濟生活——農業及工業建設的範圍中，我們屢次指出蘇維埃在經濟上所繼承的是一個爛攤子，而它表現在城市建設上更是極爲突出和嚴重的。在革命前帝俄時代的城市建設的水平是很低的，比之歐洲那些比較進步的城市自然要落後得多。我且舉幾個統計數字來說明這點。帝俄時代的 1 063 個城市中，祇有 219 個（約佔全數 $\frac{1}{5}$ ）有自來水系統，而歐洲和美國 75% 以上的城市有自來水系統。革命前夕，俄國總共只有 2 089 公里的電車線，而歐洲却有好幾萬公里電車軌道，單單美國的城市就有 75 000 公里；莫斯科平均每人只消耗 8 立方公尺家用煤氣，而倫敦每人是 400 立方公尺，柏林是 170 立方公尺。

甚至於這些落後的公用事業，在整整 8 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和武裝干涉期間，不僅沒有維持原來的狀態，不僅沒有絲毫的發展，而是有好多已經被戰爭完全摧毀了。武裝干涉戰爭極其嚴重地破壞了許多城市，如烏克蘭、烏拉爾、西伯利亞、伏爾加盆地及其他地區的城市都是在戰事發展過程中遭受到嚴重摧毀的。

德、英、法、美、日等帝國主義者和白衛軍、社會革命黨的冒牌社會主義者及孟什維克等反動集團聯合起來，嚴重地破壞了烏克蘭的城市

(基輔、奧德薩、哈爾柯夫、葉卡德里、諾斯拉夫)，北方的城市(阿爾捷格爾)，伏爾加盆地的城市(薩馬拉、加參、新比爾斯克等)，以及在西伯利亞、烏拉爾、遠東等地的城市。這些偽善地宣稱自己是文化和文明的保衛者的先生們對於那些戰前即很貧窮而且發展落後的城市却加以殘酷的破壞。

根據盧比莫夫教授所著的小冊子「外國資本家所欠我們的債務」的數字，蘇聯城市在武裝干涉戰爭中所遭受的損失不下 21 億盧布。因此，我們所接收的城市不但落後，而且是殘破不堪的，在帝國主義大戰和武裝干涉戰爭中遭受到極大損失的。

在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期間，黨和無產階級集中全部力量和注意力，以便粉碎無產階級的敵人，並將他們從我國土地上趕出去。在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勝利結束以後，在工業生產降到 20% 和農業生產降到 60% 的艱苦時期，黨和蘇維埃政府把恢復工業和農業當作首要的任務。工人們無不曉得沒有工業基礎就不可能產生城市發展的問題。當然這時城市建設的恢復工作並沒有停滯，不過恢復的速度遠落後於工業和農業就是了。

只有當工業和農業皆已完成了恢復階段並進展到建設時期——簡單的說，只有在過去 3 年中才有可能實施大規模的恢復和發展城市的計劃。現在我們已經完全恢復了我們的城市中的各種公共設施，而有些城市，如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都已超過了戰前的水平，並且進入了重建的階段。

然而，過去數年間城市建設的進度比之祖國的偉大生長；比之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速度；比之工人階級與日俱增的生活上的需要却又落後得多了。四年來，我們除了住宅供應之外，在城市建設中投進 139 300 萬盧布的資金，這雖是一筆非常可觀的資金，但與工業發展的

速度比較起來却是微乎其微。從工人階級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利益的觀點上來說，黨首先盡最大的力量來增加工業的基本資產，來促進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迅速發展，這種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否則，希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以及迅速改善工人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狀況是完全不可能的。

當我們在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在工業建設和農業社會主義建設的前線獲得了接二連三的勝利，當我們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認為在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更進一步發展的同時，還有一件重大的工作，這就是提高城市建設的水平，迎頭趕上國民經濟的一般水平，並在新工業中心、大機器拖拉機站、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莊實施舊城市的基本的社會主義重建和新城市的建設工作。

無論是從滿足工人階級物質上或文化上的需要的觀點來看，或是從工業增長——我們經濟生活的主要因素——的觀點來看，我們城市的現狀，在我們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成了一個「難題」。住宅供應、電車系統和自來水系統在工人的生活上和生產進行中都是很重要的項目，如在產煤地區，這些需要就更明顯了，在大城市像莫斯科也是如此。要是工廠附近沒有住宅，而電車又不便當，那麼，工人一早起來就得在路上花費掉好多時間，而當他跑進工廠時，他已經精疲力盡了。

落後的城市建設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障礙，而且嚴重地阻礙了文化革命的發展。

除了食物供應外，公用事業在增進工人的物質生活和實際工資問題中是個重要的因素。在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同志說：「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化的不斷生長是個無容置辯的事實，從勞動者的物質生活來看，這是什麼意義呢？它的意義便是迅速改進工農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基礎已經建立了。」如果沒有住宅的建設和城市的改造，勞動人

民生活的改善是不可能的。

我們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的時代，它的意思便是除了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全部基礎和促成國家工業化的全面發展之外，還得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廣泛地展開重建工人和勞動羣衆的文化生活和物質生活的工作。

我們碰到了雙重任務。我們必須進行城市建設工作，以最好的設施供應工人和勞動羣衆，保護工人的健康，供應他們住宅，便利他們的文化生活，供給他們最基本的需要，如電燈、取暖、下水道等設備和清潔的城市。同時，除了目前的工作而外，我們又碰到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重要任務，那就是我們城市的社會主義重建工作和如社會主義時期所加給我們的其他重大任務一樣的大規模的城市改造工程。這件工程必須在未來的經濟計劃，特別是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反映出來。

蘇聯城市建設的路線

我們建設城市的科學和技術是落後的。我們的責任便是如何在這方面努力提高技術，以達到現代科學的水平。但這還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理論基礎上發展整個城市建設工作。斯大林同志在農業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中指出，我們的科學理論的思想水平比之實際的工作落後了一大步，尤其在城市的建設和發展問題上表現得更加顯著；我們在這一方面所碰到的抽象的、不真實的、[理論]的爭辯，比在其他方面所碰到的來得多。因此，我們必須根據科學的馬克思、列寧的方法來深刻地研究蘇聯舊城發展和新城建設的總路線問題。

這個問題不僅僅是抽象的科學理論。像其他各種建設的問題一樣，理論是作為破壞舊的無用的同時建設新事物的一種工具。現在我

們碰到了三個問題：第一、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習慣的改造問題；第二、城市內部的計劃問題；第三、在全國範圍內平均地有系統地分佈工業以消除城鄉對立的工作所產生的舊城擴展和新城建設的問題。

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習慣的改造

我來講幾句關於「社會主義城市」的話吧。有許多人老是說：「我們必須快點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城市」。自從十月革命那一刻起，當我們打退了資產階級並使生產資料社會化的那一刻開始，我們的城市就已經是社會主義的城市了。那些否認我們的城市具有社會主義的特點的人，存在着一種如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反對派所採取的絕對不正確的孟什維克的論點。他們武斷地說我們的工業不是社會主義型式的，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型式的。我們反對這種觀點。雖然階級鬥爭尚未消滅，甚至變得更加劇烈了，但我們的城市，無論是從它的社會政治的特點和趨勢來看，還是從它中間的生產關係來看，無疑地都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城市。我們必須在物質上和技術上擔當起改造城市的任務，使得它們能適合新的生活情況和需要，適合社會主義時期的要求，適合在文化和政治上日漸增長的工農羣衆的需要。

自然，目前我們不能預料在社會主義最後建設完成而共產主義建設到達高潮時的社會生活方式。實際上，企圖在今天就能規定將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活方式是絕對地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沒有企圖確定將來共產主義時期的社會型式；相反的，他們警告我們不要爲這些事情操心。他們認爲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人們會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改造過程中體驗到需要並創造每一種特殊的新的生活方式。

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習慣的改造不能祇局限於廚房和餐館的問題。

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習慣的改造，從我們堅決實現列寧所提出的「每個廚工都必須知道如何管理國家」的口號起，從婦女大規模地參加蘇維埃的社會活動起，就已經開始了。兒童之家——托兒所和遊戲場的創立，俱樂部的創立以及學校的改造都是文化革命和舊人改造成新人過程中的一個環節。

列寧在他的「偉大的創舉」一文中寫道：「雖然頒佈了種種解放婦女的法律，但婦女仍然是家庭的奴隸，因為家常瑣碎事務壓迫她們、窒息她們、愚鈍她們、卑賤她們，把她們禁錮在炊爨和撫育小孩的事務上，而以絕然不帶生產性的、微小的、勞神的、祇是愚鈍人和折磨人的工作去浪費她們的勞動。婦女的真正解放，真的共產主義，祇在反對這種煩瑣家務的普遍鬥爭（它是由執掌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領導的），更確切點說，祇是把煩瑣家務普遍改造為社會主義大經濟的地方和時候才會開始。」（「列寧文選」，第二卷，599頁）

自1919年列寧發表這篇文章之後，黨和蘇維埃政權作了許多工作來實現列寧的指示。我們的婦女已有了顯著的進步，因此她們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我們必須建造洗衣房和餐館，並設立大規模的公共廚房、餐廳和咖啡店系統。我們的餐館必須建造得富麗堂皇，對工人及其家庭要富有吸引力。

外國工人和他的家庭到咖啡店去，餐館和沙龍以資產階級文化來麻醉他們。我們必須為自己建設餐館和咖啡店，它們不但供應工人以良好的食物，而且要成為文化水平很高的社會主義的宏偉的公共建築物。我們必須立即增加餐館和咖啡店的數目，並根本地來改善及建造整個公共食堂的事業。

在建造新住宅時，我們必須要考慮到托兒所、幼兒園、遊戲場、餐館

和洗衣房等公共設施，如果不是每家住宅都如此，最少每數家應考慮到有這些設備。

當然，在今後一、二年內還不能到達這些目的。目前我們主要的任務是為工人建造住宅，但是我們必須建造一些可以做為改變居住者的社會生活習慣的模範住宅。

如像我們在建設巨大的工業城瑪格力托哥爾斯克同時也建造小型的冶金工廠一樣，我們一方面必須建造廉價的住宅來解決工人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還要建造一些用新方法建造的，並附有托兒所、幼兒園、餐廳和洗衣房等公共設施的集體住宅。

像黨為總路線而鬥爭的情形一樣，在建設工程中我們也碰到了歪曲和偏差。一方面，有些人完全否認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習慣的改造工作，他們要把我們拉回到資本主義社會去；另一方面呢？我們又碰到了「左傾」的歪曲。「左傾」分子主張硬性地採用公共食堂，強迫廢除獨家的廚房等等。廢除獨家廚房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今天我們還沒有法子建造足夠的餐廳和咖啡店來滿足男女工人和他們的家庭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是不可能大規模地廢除獨家廚房的。

我們應該儘量鼓勵人們在自願的基礎上建立公社，我們決不能容忍對他們採取官僚主義的態度。我可以舉幾個在莫斯科的公社的事實。下面我來描寫在都布羅夫斯基郊外的一個幾乎全由共青團員所組成的公社。

這個公社本來有 21 個人，1931 年有 2 人退出。而其中 9 人是新加入的（原來申請加入的有 30 人）。這個公社的成員都是工廠的人員：8 位共產黨員，10 位共青團員，3 位非黨員。可以說，大部分的成員是出名的突擊工人。

全部工資都作為公共基金。平均每人得 120 盧布的工資，但有幾

位社員是有家庭的。因此，爲了孩子的住宿，便在克拉斯哥哇那裏向私人租了一家農舍。鄉村農舍信託部是不給予他們任何東西的。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蘇維埃和合作社的組織機構都給予公社應有的鼓勵。例如衣物還得送到西蒙諾夫斯卡亞洗衣房去，因爲在都布羅夫斯基的分店藉口它們不收受機關幹部的衣物等理由而拒絕收受這些衣物。

我們應該給予這種組織以一切可能的幫助，不要妨礙它們的設立，我們必須幫助他們，反對以官僚主義的態度去對待他們。

同時，我們也必須竭力反對如上所述的強迫推行此種組織的企圖，正如我們必須反對那種「前進」兇猛的、有害的和無用的企圖一樣。

譬如沙伯索維奇同志在一年前提出一個不可能實現的荒謬不堪的建議，他說：「所建造的住宅應該容納2 000—3 000人。在這些住宅中不要有獨家的廚房、洗衣房、普通的房間或家用房間。住在這種住宅內的每個工人應有一間作睡覺用的或偶爾休息用的小房間。夫婦不要有共同的房間……在這些過渡時期我們沒有多餘的時期，歷史規定我們沒有時間實驗，沒有時間作長期的研究……所以我們必須立即進行這件工作」。

像這樣「左傾」的空話，對於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進行徹底改造社會生活習慣的工作，祇是帶來了損害。我們必須進行有系統的廣泛的建設工作。這樣，我們才是以實際行動而不是用空話在新的社會主義基礎上全力進行社會生活的改造事業。

城市規劃

城市規劃是個重大的問題。我們在這方面的科學知識是很有限的；我們這門學科是不高明的。革命後，我們在實際生活各方面的馬

克思主義的研究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績，但在建築或城市規劃的範圍內，我們僅僅碰到問題的邊緣，而在改造城市居民的社會生活習慣上，這却是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城市規劃有種種不同的形式：放射式的、環形式的、棋盤式的、直線式的等等。但是我們尚沒有找出社會主義城市規劃的形式和原則：如新城市應該採用甚麼樣的佈置以及舊城市應該如何重新規劃等等。現在已組織了無產階級[建築師協會]，會員同志們正在熱情研究蘇維埃的建築和城市規劃的新方法。他們正碰到了不少困難，我們應該幫助他們。不過他們中間某些人在城市規劃問題上有一種過於簡單的想像，認為放射、環形系統是封建的，棋盤式是資本主義的，而直線式是小資產階級的等等諸如此類的想法。企圖如此解決城市規劃問題實在是太機械了。他們沒有考慮到城市的許多複雜的地理上與經濟上的特點。

很顯然的，對於城市內部的佈置，我們必須找出自己的計劃來。當我們建造一座工廠時，我們要請最好的專家往往是外國的專家來幫助我們作精密的計劃和設計。但是當碰到計劃一座新城市時，事情就進行得很混亂，因而得到不良的後果，而必須花費極大的資金和力量才能糾正過來。下面便是一些例子。琪諾列岑斯基化學工廠建造了一片居住新村，卻沒有把建築工廠所需要的土地計算在內，結果呢，新村的一部分便不得不加以拆除。不但如此，新村還建築在工廠的下風，工廠的煤氣和煙灰都吹到新村中。或以瑪格力托哥爾斯克為例，當我們要建造這樣大規模的工廠時，每個人都很感興趣，但是在瑪格力托哥爾斯克城附近要來建設一個勞動人民的中心區時，我們碰到了些什麼問題呢？我們所選擇的基地太小了，只能建造一個很小的新村，因此現在我們不得不加以擴充了。又如諾沃古茲聶斯克城，後來的結果證明

它的基地完全不够用，現在不得不予以重新佈置，重新規劃。

我們必須科學地來研究一座城市應該建在那裏以及應該如何建造的問題。如果我們對這個問題不加以科學的和技術的處理，我們將不能發展我們的城市。

我再舉一個關於舊城——莫斯科——的例子。大家知道，舊城市特別是商業中心都是混亂地成長起來的。當你在莫斯科的偏僻街道或小路走過時，你會得到一種「這些路大概是由醉漢佈置的」的印象。帝俄時代的舊市政議會曾經企圖將莫斯科重新計劃一番。但卻毫無結果。原因是：一、舊市政議會眼光小，看得不遠，而且工作範圍也太有限；二、舊市政議會與每個小塊土地的所有人都有利害衝突。當舊市政議會要展寬一條街道時，路兩旁的地主就不允許，所有的糾紛就都送到沙皇那兒去決定。

十月革命掃清了這種阻礙。我們可以根據一定的經濟條件來規劃我們的城市。假使我們有一個計劃，我們一定會得到很大成就的。特別是莫斯科，我們沒有過而且現在仍舊是沒有一種適用的建設新街道和改造舊街道的計劃。工程師雪斯達柯夫有過一個計劃叫「大莫斯科計劃」。但它只是紙上談兵的計劃，完全沒有考慮到經濟和社會的條件，所以它是經不起批評的，它只不過是繪圖室裏的產品而已。

再來舉個例子說明科學的城市規劃的問題如何沒有被重視吧。雖然事實上誰也沒有批准雪斯達柯夫的計劃，但莫斯科市某些在企業部門工作的共產黨員們竟根據這個計劃來撥地進行建築。

科學的城市規劃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它是一個重大的實際問題。以莫斯科為例，我們所擬定的關於建築 50 萬人的住宅及自來水、電車和地下鐵道系統等巨大計劃必須在一個統一的總計劃中聯繫起來，我們必須明確在什麼地方建造和如何建造的問題，我們必須

根據一個周密的計劃開闢新的街道，我們必須整頓彎彎曲曲的舊街道。所以當我們建設新城市時，我們必須預先開闢寬廣的街道，綠化林蔭大道，同時對於城市的外貌和建築的形式預先作好設計。

計劃中必須縝密地作好在工廠附近或市中心建造新住宅的設計工作。這些市中心區需要各種改善，例如自來水、下水道、電話、道路、便道、電車線等等。我們必須考慮到當時的經濟情況，包括已有的工廠、大住宅、新醫院等等。我們不能讓那些矮小的、難看的、破爛的住宅留在市中心。

當然我們不能容許像在資本主義城市所普遍存在的混亂發展的現象發生在我們的城市中，這種發展的結果，便是在小小的土地上集中了大量的入口。我們必須計劃我們的城市，使得其中的居民在各區平均地分佈，因而也就平均分佈文化機構，如學校、醫院、俱樂部、戲院、公共浴室、商店等等。

舊城的擴展和新城的建設

現在我要從有系統地計劃城市內部這一問題來談談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在蘇聯有系統地分佈基本建設和城市擴展的問題。

中央委員會通過的決議中，有一點極為重要的，就是從 1932 年起，在大城市中，特別是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不再建造新工廠。

很顯然的，這一個決定並不是因為中央委員會不重視像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這樣的大工業中心，或是想降低它們的重要性。這一個決定是因為我們整個共產黨的政策便是將生產力在全國範圍內作有計劃的分佈。

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過去的增長和今後的發展全都是混亂不堪的和毫無計劃的。而我們的城市發展是以國民經濟的總計劃在全國範

國內平均分佈的生產力和最大限度的使用自然資源為基礎的。

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從一個封建中心第一步發展為商業中心，再由商業中心發展成工業中心。市場是促成大城市發展的主要因素。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城市的發展是很混亂的，正如他們在工業方面是毫無計劃的混亂發展一樣。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反映出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發展規律；反映了那良好的和進步的特點，同時也反映了不良的特點和衰退的因素。當它們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這些不良的特點和因素表現得特別突出。

因此，蘇聯城市發展的道路和資本主義的城市是完全相反的。在蘇聯，決定城市發展的因素不是市場，而是有計劃的工業的發展，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生長和全國生產力有系統的發展和分佈。

烏克蘭的幾個城市的命運可以生動地說明我們城市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城市有什麼區別。在烏克蘭右岸有許多城市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的基礎上發展成商業中心的。但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當私人商業差不多完全歸於消滅，而合作經濟正在大踏步前進的時期，這些城市不僅是在人口上大為減少，而且根本就將歸於消滅。然而同時在烏克蘭左岸整個的頓巴斯——斯大林、魯根斯基、馬克烏貢夫卡及其他工業城市——和整個蘇聯，我們看見城市的迅速發展，從前只有 10 000—15 000 人的小鎮，現在已經成為 10 萬或 10 萬以上的城市了。這是因為工業迅速發展的結果。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只有根據一個統一的總計劃來協調地配合生產力的那種社會，方能允許工業在全國作這樣的分配，使之最能適合於它自身的發展以及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與發展。所以城市與鄉村的對立的消滅，不但是可能的，它甚至是工業本身以及農業生產的直